

粟裕与车桥战役

野 泉



粟裕(左二)在指挥车桥战役

敌情进行直接调查考察,找干部、群众交谈,并与下属指挥员一起进行探讨,从而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当时的车桥被划归宝应县)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

可以说,粟裕最终决定把车桥作为打击日伪军的主战场,是经过长达9个月的酝酿、对比、研究的。除了实地调查之外,他还经常对着地图进行反复推演,与参谋人员商讨作战的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难怪后来粟裕的子女说,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地图。

当然,粟裕绝不是只能靠长时间的精心准备才能打胜仗。比如他在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就通过对战争的深入思考,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设想。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淮海战役的大幕就正式拉开,到战役结束时,共进行了66天,敌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为60多万和80多万。

粟裕对每一次作战都下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功夫、笨功夫,比如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反复的思考酝酿,正是这些苦功夫、笨功夫才练就了粟裕在军事指挥上的真功夫,成就了这位被无数军事爱好者推崇的一代战神。

1944年2月,经过半年多的备战,粟裕认为攻打车桥的时机已成熟。在苏中区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粟裕提出了“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反攻”的战略思考,启发和提高了参加会议的苏中区党政军全体干部对苏中及整个华中战场形势的认识,会议形成了组织发动“车桥战役”的决议和作战方案。

作战方案形成后,他将行动计划报华中局和军部。这个设想并没有得到华中局领导的同意,华中局领导明确:“不准打!”理由是,会刺激日军,加大对新四军的报复。但粟裕没有放弃,直到四中队送来一份情报,他才下定决心拿下车桥。这份情报点明了车桥的驻守部队是日军第64师团和第63师团的结合部,这两个师团的师部分别在徐州和扬州,一旦战役打响,徐州、扬州方向的日伪军不会增援车桥。因为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和误会,会让徐州、扬州日伪驻军错以为对方支援了。而唯一有可能来增援日军的,只有淮安方向的少量日伪军,一师完全有能力应付。

机会一旦来临,就立即行动。粟裕调集了三万兵力,全力投入对车桥的攻击。总的部队被分为两个方向,第一师第七团负责主攻任务,其他四个团负责阻止援军,分别防守车桥镇的南北两侧,并且与新四军三师联系予以配合与支持(如朱子战斗),保障攻击车桥部队的南北安全。

这是粟裕的标志性战术——围敌打援。他明白战争中出奇制胜的重要性,但也深知必须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他知道,只有通过足够的准备,才能确保通过奇兵奇招获得局部优势从而转化为整体的胜利。

车桥镇的守军只有540多人,其中日军只有一个小组,40人,剩下的都是伪军。虽然粟裕投入的兵力看起来占有绝对优势,但是日军采用了堡垒战术,使得车桥镇变得难以攻破。因此,粟裕一直强调隐蔽作战,尽可能减小动静,避免提前引起敌军的警觉。

粟裕为了做好大部队行动的保密工作,早就布置宝应县委动员3万多民兵和群众,于曹甸、安丰等地筑起顶宽1丈,高出水面5尺,穿越湖荡,绵延约15公里的5条大坝,以便于攻击部队奔袭车桥。又组织了数以千计的船只,穿越宽阔的马家荡、绿草荡水面,把部队云梯和其他器材及担架队运送到车桥附近。还组织精干民兵利用夜间开挖沟塘,破坏敌伪据点之间的道路。



延安《解放日报》关于车桥战役的报道

路、桥梁,协助军队埋雷、放哨和监视敌人。

为了策应战斗,粟裕还在战前安排管文蔚在东台分头带领一部分部队转移,以“声东击西”战术分散敌人注意力,麻痹车桥守敌,直到战役发起之前,车桥守敌依然毫无戒备。

车桥战役,新四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掏心”战术,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二百里的地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打乱了日伪“扩展清乡”及“强化屯垦”的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揭开了抗日战争中苏中地区战略反攻的序幕。

车桥战役共歼日军460余人(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

车桥战役结束后,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从淮南黄花塘发来电报。饶漱石在电报中指责车桥战役说:“不宣主动的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过分刺激了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的大报复”,“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等等。电报还责令一师和区党委几个负责同志对此作出检查。

正值此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车桥大捷”的消息,赞扬苏北新四军“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祝贺胜利。在延安的陈毅代军长给一师发出了嘉奖电:“车桥之战,连战告捷,斩获甚多,发挥了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开创了华中生俘日寇的新记录。除通报外,我们代表全军庆贺你们的胜利。”这些,压碎了华中局对粟裕的批评。

从此,“车桥战役”载入我军史册,成为军事家和军事学者研究的经典战例。

在车桥战役重大胜利的鼓舞下,新四军各部相继对敌发起攻势,不断出击,捷报频传。

苏北军民发起高沟、杨口战役,攻克据点14余处,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连成一片,紧接着取得了沿海攻势作战和阜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苏北解放区;淮北军民在攻势作战中,解放泗洪、灵璧、睢宁三县之间的地区,扩大了淮北津浦路东解放区;苏南军民一度



1944年3月,车桥战役胜利祝捷大会上的各界人士

攻入长兴、溧阳等县城,并向苏浙皖边发展;淮南军民在袭击盱眙、定县县城后,粉碎了日、伪军对淮南中心区的进犯,巩固了淮南路东根据地。

1944年,华中敌后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160余万人,极大地改善了华中敌后的斗争局面,为1945年新四军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苏中军区经过1944年的春、夏、秋季攻势作战,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恢复了1940年时的地域,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苏中根据地及其周边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移驻到车桥、曹甸地区,并组建苏中区委党校,车桥也成为我军抗战反攻的重要根据地。

车桥战役,创造了华中抗战史上我军对日本一次作战毙伤日军人数第一,华中及全国抗战史上一次战斗,我军生俘日军人数第一等多个战争奇迹。2017年3月5日,车桥战役纪念馆新增一份日方史料,首次证实:我军记载于战役中击毙的“山泽大队长”,为独立步兵60大队大队长三泽金夫大佐,死后被迫晋少将。这也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江苏击毙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之一。

今天缅怀粟裕,他的军事思想只是一方面,更是要学习他谦逊朴素的为人风范和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

淮安府署三槐台

张 雪 王 磊 徐爱明/文图

卢福臻《咏淮纪略》中有首《三槐堂》诗,咏诵的是淮安府署中的三槐台,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人们不禁会问:三槐台是什么?为何以“三槐”为名?为何要建三槐台?让我们一起走进淮安府署后花园,探寻三槐台的风采。

三槐台是什么?

如果要问:三槐台是什么?相信现在参观过淮安府署的人,都会认为:三槐台就是一个临水平台,跟府署正堂前月台一样的平台!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台是一种高出地面的露天的、开放的、平面建筑物。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中的凤凰台等,这些都是在平地或山顶上建筑的露天高平台。同时,台也是一种高台上建有高大建筑的建筑物。如,商纣王自尽的鹿台、燕昭王招纳

于称呼“台”的建筑不能一概而论,要深入实际,了解真相,仔细辨别。

事实上,淮安出现台式建筑的历史也很悠久。南宋《舆地纪胜》卷三十九《淮南东道·楚州》“景物上”记曰:“熙台,在子城上。”也就是说,在南宋时期,淮安就有了“台式建筑”——熙台(相当于后来的角楼),而且它是能够代表淮安的景物之一。楼阁在《北行日录》中就记載道:“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时到楚州,登熙台。”楼阁在出使金国时,经过楚州,登上熙台观赏楚州风景。这件事后来被范以煦记到了《淮浦小记》中。此后的淮安府县志中都把宋代城墙上的“熙台”作为“古迹”记载。正德《淮安府志》记曰:“熙台,在府子城上,宋筑。”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熙台,东南子城上。”明确熙台在淮安城上的位置。非常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的淮安文人们还用“熙台”来作自己的号或者字,如明朝的潘埙(1476—1562),字伯和,号熙台;清朝的范以煦(1817—1860)把“熙台”作为自己的字。

所以,淮安府署三槐台不是夯土建筑而成的高台,而是在高台之上建有厅堂楼阁的台式建筑。明代天启《淮安府志》中把三槐台记为“三槐堂”,清代康熙《淮安府志》中仍然把三槐台称为“三槐堂”,这就足以说明三槐台是与淮安府署镇淮堂、清德堂等相似的楼阁式建筑物。乾隆《淮安府志》则记载为“三槐台,七间”,这里虽说把三槐堂又称为三槐台,但更为重要的是,乾隆《淮安府志》用具体的数字——“七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三槐台是有七间房子的楼阁式建筑。后来的府县志中关于三槐台的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简略,显得语焉不详,这可能是导致人们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因为没能亲眼看到三槐台,就只能凭想象来理解,写出“台高百尺署三槐”的句子来,就很正常了。

为何以“三槐”为名?

淮安府县志中第一次出现“三槐台”的名字

是在陈文烛等人编纂的万历《淮安府志》中:“知府宅在正堂后。西有清德堂,中有青玉堂,后有三槐台,登之可望后城也。”为什么把这个建筑命名为三槐台呢?

这就得从槐树说起。槐树在我国国家有“国槐”的称呼,是一种吉祥树。它被认为是“灵星之精”或“虚星之精”,不仅神奇异常,有决断诉讼之能,而且因为“槐”“怀”音同,有助于怀念远人。尤其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槐树因寓意“怀念家国”而备受海外游子青睐,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之一。且槐叶、槐籽有蔬菜食与药用价值,可炸熟水淘过食,亦可作代茶,有宜身强体、延年益寿之功效。因此,槐树被人们珍视,被誉为吉祥物,也就理所当然了。

槐树还是公相的象征,是一种富贵树。《周礼·秋官》载“面三槐,三公位焉”。是说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周代最高官职太师、太傅、太保)的称谓(朝见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人因以“三槐”喻“三公”,由此槐树成为三公辅官位的象征,以致后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槐官相连的名词,如:“槐鼎”比喻三公或三公之位,亦泛指执政大臣;“槐卿”指三公九卿;“槐握”指有声誉的公卿;“槐绶”指三公的印绶;“槐府”“槐第”指三公的官署或宅第,等等。

槐树还是科第吉兆的象征,是一种文化树。唐代开始,科举考试关乎读书士子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能借此阶梯而上,博得三公之位,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因此,常以“槐”指代科考,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槐黄”。“槐”象征着三公之位,举

仕有望;且“槐”“魁”相近,企盼自己得魁星神君之佑而登科入仕。

世人喜欢在庭院中植槐,除了取其树荫庇护之外,目的常常就在于讨个好兆头,期冀子孙发达,祈愿子孙位列三公、能出达官贵人,正如《花镜》所言:“人多庭前植之,一取其荫,一取三槐吉兆,期许子孙三公之意。”因此,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们在淮安府署后花园余乐园里植槐、筑台,名之为“三槐”,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他们不只是希望自己作为臣子怀柔百姓、奉事帝王,更是期盼自己不断进步、步步高升、位列三公,也希望自己的子孙能科考及第、扬名入仕,成为宰辅之类的砥柱中流。



三槐台(正面)

那么,也许有人问:淮安府署为什么要建三槐台呢?因为三槐台的建造者、建造时间史上都没有明确记载,我们还是要回到淮安知府许令典的《三槐台咏》诗中,诗曰:“谁架高台眺望平,三槐无树只空名。藩篱不限千家月,睥睨遥临百雉城。行踏莓苔惟鸟迹,坐筹钱谷念民生。移丘且欲持螯酌,恐负重阳一日晴。”从诗中可以看出,三槐台的现实作用就是“登眺”观景,就是万历《淮安府志》中的“登之可望后城也”,就是天启《淮安府志》中的“三槐堂在后,可登眺”。试想,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公务之暇,登高望远,饱览淮安“后城”风景之时,还“坐筹钱谷念民生”“恐负重阳一日晴”,也就无可厚非了。

三槐台是在明代中叶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之后,整个社会奢侈享乐之风方兴未艾的背景之下建造起来的,其本身兼具娱乐功能:文人士大夫们可以开辟出专门的房间,以供藏书读书之用;可以在闲坐亭台楼阁之中,静思体悟人生之道;可以呼朋唤友“盘筵饭竹,竞夕不休”;也可文友诗会,相互和答,借景咏志。嘉靖二十九年(1550)任淮安知府的张敦仁在《偷乐园记》中写道:“稍暇则角巾布履,或抱膝亭中,悄无人声;或蹑桥观水,冷然湛湛;或抚桧倚槐,朗然孤吟。”諸如此类的文化活动充实了文人士大夫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了他们独立人格需要的理想生活方式,这些空间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生天地。

《礼记·月令》中说: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即:仲夏五月,可以在高明之处,可以从高处向远处眺望,可以登上山陵,可以住在台、榭之中。古人认为避暑的方法之一就是居住在台、榭之中。“榭”和“台”类似,按《说文解字》中解释,台上有了屋子,就称之为“榭”。淮安的夏季炎热潮湿,多暴雨。在暑热的夏天,三槐台无疑是避暑的好去处。

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三槐台又具备了